

# 基督教的“文本理论”

——读《圣书的子民》<sup>①</sup>

Text Theory in Christianity

——On Reading *People of the Book*

郭慧华 中国人民大学

Guo Huihu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崔秀云 沈阳师范大学

Cui Xiuyu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358

[Abstract] David Lyle Jeffrey, the author of *People of the book*, reinsta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ical text in response to postmodernism's revolt against text theory. By a thorough reading and serious reflection of the book, the researchers of this paper seek to understand how the author achieved this feat at a time when postmodernism and deconstruction still carry the day. However, the paper notes that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iblical text, David Lyle Jeffrey does not provide a clear path toward meaning. In this regard David Lyle Jeffrey and Derrida, who was refuted by him as a deconstructionist,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①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圣书的子民”一词源于《古兰经》，原是对犹太人轻蔑的称呼，然而犹太教却将其自豪地接受下来，使其成为一个合法用语。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几乎颠覆了所有传统文本的处境下，基督教文本传统作为“逻各斯主义的”（而在谢大卫看来这种划归是种曲解）理论也自然不能免于其责难，圣经的权威无疑受到了威胁和冲击，基督教群体还能否成为“圣书”的“子民”也将成为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谢大卫（David L. Jeffrey）的《圣书的子民》一书通过回溯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以回应解构主义对基督教文本传统的曲解和挑战，从而恢复基督教文本权威。

## 一、文本的权威性和符号性

谢大卫认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布鲁姆（Harold Bloom）等人歪曲了基督教文本理论的传统，“曲解历史上圣经对基督教作家和读者的作用。”<sup>①</sup> 哲罗姆（Jerome）和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是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的代表，所以，在回应过程中，对他们思想的重提和梳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圣哲罗姆以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广为人知，他的译本在西方基督教作为通俗译本使用长达 1000 年。但是他的解读世俗文本理论却不像他的翻译被人重视，而谢大卫对他的这一理论的价值做了肯定和挖掘。哲罗姆鼓励借鉴世俗文学，但他对世俗文学的强调是基于对世俗文学的应用，把世俗文学作为手段的基础上，“许多事物如果仅仅起着手段的作用，它们就是有价值的，但是一旦允许它们成为目的，成为我们精力的主导倾向，那么这种转变如

<sup>①</sup>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7 页。

何细致,都会对我们的灵性造成灾难性的影响。”<sup>①</sup> 谢大卫认为哲罗姆对于异教文学的辩护是运用了一种传统的寓言方法,其目的“并不是推崇异教文学本身,而是使用它为更高的目的服务——让每一个基督教徒都有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奉献。”<sup>②</sup>

而奥古斯丁则在更大程度上发展了圣经文本和语言的理论基础,并对以后索绪尔称之为“研究社会中符号活动的科学”有着明显的影响。奥古斯丁区分了手段和目的,使用和享有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享有某物就是出于对事物本身的爱而依恋它。使用某物则是运用它去获得你所爱之物,如果它值得你爱的话。”<sup>③</sup> 如果把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则是一种偶像崇拜,就像对于文本的“享有”,结果就会使得“我们智性和灵性的目标混淆不清。”<sup>④</sup>

显然,基督教文本传统并不是以圣经本身为中心。“作为文本,圣经的作用被认为是协助它的终极作者——上帝同堕落、疏远上帝的读者重建和谐的关系。”<sup>⑤</sup> 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他们把文本作为一个符号,在他们看来,符号所指向的上帝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基督教文本理论认为有效的阅读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不应该自以为是。一方面他们重视圣经,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不可允许个人意图的“侵入”;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圣经仅是一种符号,符号不等同于所指事物本身。

那么,基督教文本传统与解构主义者所要消解的“逻各斯主义的”当代西方文论就区别开来。谢大卫指出了后来的形式主义批

①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71 页。

② 同上,第 73 页。

③ 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转引自[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76 页。

④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76 页。

⑤ 同上,第 5 页。

评和基督教文本理论之间表面相似之下本质的不同。他以新批评派中汉斯·费雷的理论为例说明了基督教文本理论和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文本自身具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几乎神圣的地位,成为了由悖论和反讽等修辞手段建构而成的自我封闭的意象世界。”<sup>①</sup>表面上看来,无论基督教文本理论还是形式主义理论都倾向于强调文本的权威和不可侵犯性,文本自成一体。然而在基督教文本理论中,圣经被置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排斥的是个人的意图,而形式主义是出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感和拒绝。两者对文本自身权威的维护的动机和最终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基督教文本理论是试图更加接近上帝的意志;形式主义最后的兴趣则落到了文本符号自身,而不是文本所指。“‘批评’与其说是阐释或中介,还不如说成了理性的布道,对文本的形式或审美特性——尤其对诸如体裁、象征性语言或韵律等文字技巧的特殊发展——顶礼膜拜。”<sup>②</sup>这恰恰是基督教文本理论所反对的偶像崇拜。

另外,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不同于将语言偶像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们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认为语言不能完美地传达“终极真理”。所以,正像谢大卫所认为的那样,“基督教的理论也许是以逻各斯为中心,但并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sup>③</sup>不过在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者看来,语言的匮乏却同时也彰显了意义的存在:“语言不能达意这一现象让我们看到了诗中‘他者’的存在,他在诗中自由穿行,或与我们相遇,或拒不与我們进行精神交流。”<sup>④</sup>在谢大卫看来,德里达和布鲁姆等人对于“他者”的存在的怀疑出于

① 汉斯·菲雷语,转引自[美]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85页。

② [美]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86页。

③ 同上,第10页。

④ 斯塔纳(Steiner)语,转引自[美]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9页。

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基于现象学家的理论，“观察者不可避免地把自我投射到被观察到的事物上去”，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受任何主观投射的纯客观的“他者”；另一方面，这种怀疑理论是受到了以内省为主要特征的主观论思潮的影响。很明显，谢大卫认为这种消解“过去的权威”的理论做法是不妥的，因为“这显然使得现在高雅作品和低俗作品同样理直气壮地鼓吹自恋和以自我为中心。”<sup>①</sup>

所以，解构主义者将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来批判以颠覆圣经文本的权威也就不能成立了。

## 二、堕落与渴望——意义的流失与寻回

362

谢大卫是以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为主要基点对解构主义的文本颠覆言论进行批驳的，所以很自然地会涉及信仰的问题。显然，透过《圣书的子民》这一书名也能看出，谢大卫对于德里达、布鲁姆等人的回应，或许主要基于对圣经文本权威的维护。事实上，他自己对此也并未隐讳，“圣经作为过去基督教统辖西方世界中的文学传统的基石地位，现在的人们还多多少少怀有敬意，然而德里达和布鲁姆对圣经的这种曲解，将使人们对圣经仅存的敬意荡然无存。”<sup>②</sup> 不过，这点并不妨碍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受到有关文本、意义问题的启发，“当代基督教神学的最重要特质，常常也正是将‘信仰’的问题转换为‘意义’的问题。”<sup>③</sup> 所以，谢大卫重构基督教文本传统的过程也是寻回意义的一个过程。事实上，谢大卫在此

①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87 页。

②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前言》，第 7 页。

③ 杨慧林，“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文艺研究》2004(3)，第 35 页。

书中将意义和信仰的问题的讨论常常糅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将重塑信仰和寻回意义的事件统一在一个模式中：上帝与真理(作者) ↔ 圣经(文本) ↔ 基督徒(读者)。在这个模式中，意义在三个要素之间双向流动。而西方文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可以转化为意义的流失和寻回问题。

在“上帝与真理(作者)→圣经(文本)→基督徒(读者)”这一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是意义的流失。真理在流向人类时，不断散失，因为“模式”中的后一个元素总是和前一个元素有着隔阂。“言不及义”、语言的局限性等文论史中的问题正昭示了这点。但是，人类不能因为不能拥有全部的真理而拒绝部分真理的追寻，所以，圣经对于上帝道的表达也是有意义的。谢大卫也明确指出，“表达出来的意义即使是真实的，也总是片面的。不过，我们继续进行不同的表达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多次相遇中总是发现，各种表达尽管不完美，但却是有意义的。如果文本被颠覆，表达被拒绝，通往真理的道路将完全断裂，人类甚至也将失去了对部分真理的领悟。”

而“上帝与真理(作者)←圣经(文本)←基督徒(读者)”的模式则关涉了西方文论史上“诠释”问题。谢大卫认为，人类的堕落使得人类处于中间的位置，“离开伊甸园造成了现在与起始之间、造物主和他的被造物之间的深深的裂痕；简言之，人站在中间的位置观察事物，既无法领悟起始，也无法把握终结。”<sup>①</sup> 所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亚当和夏娃对于上帝意志的违背，与其用“堕落”来表达，还不如用“分裂”或“疏离”表达更为合适。吃了智慧果的人类获得了一种反思能力，但这时人类的意识也从无意识中分离出来。“这种能力(反思能力)既是堕落思想不可救药的局

<sup>①</sup>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132 页。

限性和主观性的起源,也是它们的结果。”<sup>①</sup>

奥古斯丁也曾指出人类和上帝、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他认为,神创造的天地万物和作为神启的圣经是一本“外在之书”,人类根据“外在之书”自己所创造的就是“内化之书”。人类作者“只是文书或翻译者”。中世纪的许多作家也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作者是一个学生,他所写作的文本是置于一个语境之中的,在意义上指向另一个文本。”<sup>②</sup> 这种观点使人想起柏拉图的“影子的影子”学说,他认为世界是“理念”的影子,而文本则是影子的影子。而人类是否能理解终结和起始,人类的智性能否指向上帝的意志?这个问题在中世纪的基督教读者看来,“终结被看作融会了所有的事物,甚至包括起始。在人类话语结构中,也偶尔显示出对终结的领悟,但这种领悟是通过类比得以体现的——简单地说,就是从人类撰写的次要文本去领悟上帝的大书。”<sup>③</sup> 即他们认为人类可以领悟上帝的道,但是并不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类比。谢大卫认为这种类比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和上帝创造的世界。但我们仍必须面对一些问题:语言的多义性,人类理解力的局限性……,显然,这些问题都使得上面提到的隔阂、距离更为深刻,也使得通向真理和意义寻回的道路更为坎坷。

### 三、“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 ——通向意义

确定了意义的存在和文本的权威,面临的一个问题则是,堕

①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132 页。

② 同上,第 142 页。

③ 同上,第 149-151 页。

落的人类如何通过阅读圣经文本来领悟上帝的道和终极意义，读者又如何通过世俗文本来接近作者传达的意义。

然而，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接近文本作者的意图？另外，“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向读者揭示出作者意图，这种能力也是有限的。”<sup>①</sup> 文本和作者的意图存在着距离，同时读者和文本之间也存在着距离，所以读者和作者的意图或者终极真理之间的隔阂将不可避免。而对这个问题的涉及在奥古斯丁那里就体现为，通过手段是否能达到目的，通过对于文本符号能否达到对道的理解。奥古斯丁认为符号不仅仅具有随意性和固定性，同时也具有选择性。“符号会撒谎它们也可以忠实地显示意义，但并不是直截了当，而是通过一种复杂的(或迂回曲折的)方式。”但是奥古斯丁认为这种方式可以给读者带来快乐，“通过比拟(象征、比喻或刻画细致入微的语言)领悟到的意思和通过艰难寻求才发现的事物会给人更大的快乐。”<sup>②</sup>

同时，奥古斯丁相信人类不可能通过单一的视角实现完全的理解，“因此无论现在或过去的读者们的谈话、教会的见证，都会对任何人的解读尝试形成一种重要的抑制作用。”<sup>③</sup> 因此，阅读活动既是一种共时的也是历时的，而不是一个个体的活动。所以对于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知识的学习是有必要的。那么奥古斯丁主张借鉴异教学者的理论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另外，“奥古斯丁认为每一种思想的或探索的方法都值得研究和加以系统化，也值得

①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174 页。

② 奥古斯丁语，见《论基督教教义》，转引自[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78 页。

③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78 页。

去建立理论阐释其约定俗成的设定。”<sup>①</sup> 这一思想到了伽达默尔那里有了系统的理论,即所谓的“视域融合”。<sup>②</sup>

然而,阅读作为一种个体行为也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读者的意图侵入文本是不可避免。读者和文本权威之间矛盾对立是不会消除的。一方面“基督教的思想(无论是圣经时代、中世纪或现代)都是建立在人类理解力具有局限性的理论之上的。”另一方面,基督教思想也一直对人最终充分的理解能力抱有信心。如何把握文本的权威和读者的意图是文本理论中重要问题。奥古斯丁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信仰基督教之前的奥古斯丁是抵制承认自己在面对文本时的局限性。信仰之后,他接受了人类在了解起初状况的局限性。如果仅仅依赖自己“那么我思想、存在和意志都会局限在一个圆圈内。如果没有超越自身的参照物,我们的思想就会把这个圆圈当成是无限和初始的现实,其结果是着魔般地在狭小的范围内运转。”<sup>③</sup> 杨慧林教授在讨论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挑战“作者”理论时也指出,“他(巴尔特)的‘作者之死’以及福柯的‘作者的消失’,既意味着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任何作品,也意味着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的意义。”<sup>④</sup> 人类并不能由自我通往意义。

在此理论基础上,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对上帝的敬畏”可以推动学者的意志靠近上帝,并使之与上帝的意志相符。他一方面反对将理解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不顾“上帝的意

①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80 页。

② 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 372 页。

③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133 页。

④ 杨慧林,“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文艺研究》2004(3),第 36 页。

志”而将阅读变为纯个体的行为。“顺从于字面意义，把符号当成它们所指的事物，是卑躬屈膝的懦弱；同样，徒劳无效地解释符号是一种胡言乱语的恶行。”总之，在奥古斯丁看来，对于上帝的爱才能造成有效的阅读：“爱，是灵魂为自己的缘故向享有上帝的方向的运动，为上帝的缘故享有自己和邻人的方向的运动。”“而无效阅读是贪婪的结果，是灵魂为了并非上帝的某物的缘故向着自己、邻人、和任何物质事物的方向的运动。”<sup>①</sup>

乔叟(Geoffrey Chaucer)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他鼓励读者应该通过文本看到更深层的寓意。另外，和乔叟同时代的另一个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认为阅读圣经应该知道作为神的作者希望读者知道什么，面对文本，读者应该虔诚地靠近上帝的意志。但是，同时他也认识到作为读者的局限性。于是，约翰·威克利夫提出了要想了解作为作者的上帝的意图时读者应该具备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一，读者要有符合道德的性情，并使其成为主导的情感；其二，要有学习哲学的经历(这可以使一个人更具有专注的能力)；其三，要身体力行高尚的品德。”<sup>②</sup> 总之，作为读者，基督教思想理论者，无论是哲罗姆奥古斯丁还是乔叟、约翰·威克利夫他们都主张文本的权威性和对真理以及意义的坚信，“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

## 结 语

谢大卫借助基督教自身传统文本理论很好地回了解构主义者对意义的消解，从而恢复了文本的权威和价值，使得被埋葬的意

① [美] 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 81 页。

② 同上，第 160 页。

义得以再次彰显,基督教群体也重新成为“圣书”的“子民”。事实上,解构主义自身存在着漏洞。如果解构主义者不承认有一个本源性的、存在性的、纯净的“意义”,那么他自己的言说(包括他对文本意义的消解本身)都将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思考‘意义’、再通过‘陈述’,去传达意义的时候,我们所依托的正是‘意义’自身的可靠性。”<sup>①</sup>

然而,有意思的是,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它渴望超越经验,渴望在‘别处’,完全脱离尘世。”<sup>②</sup> 这种超越并非通向虚无,德里达对文本权威的颠覆并非是完全消解意义,而是“恰恰包含着对‘意义’的建构”<sup>③</sup> “为了使意义得以发生,我们……需要延宕我们对完整意义提出的要求,……所有的差别都始终在延缓意义的完整。”<sup>④</sup> 德里达的“超越经验”以通往别处意义的理论,会使我们很自然想到谢大卫的一段言说,“我们之所以可以达到这种和谐,是因为‘我们的作者’本人已经指出了道路,而‘读者’也愿意服从他,进而跟随他到达十字架的脚下。然而对一个悔罪的基督徒来说,这一时刻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经验——这转意归主的经验象征性地救赎了以前的经验,这就如同信徒表明了顺从终极作者的意图,神的智慧就会在他们心中得以确立。在那一时刻,语言充分表达了意义,而我们则超越了语言。在那一刻,我们静静地站在道的前面,在这寂静之中,天恩会为我们保留这一时刻的体验。”<sup>⑤</sup> 站在基

368

① 杨慧林,“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文艺研究》2004(3),第40页。

② [美]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329页。

③ 杨慧林,“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文艺研究》2004(3),第42页。

④ 大卫·特雷西语,转引自杨慧林,“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文艺研究》2004(3),第42页。

⑤ [美]谢大卫著、李毅译,《圣书的子民》,第188-189页。

基督教文本传统基础上,谢大卫认为我们最后可以达到“各种意图之间的和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如果说德里达没有消解意义,他只是因为意识到了传统文本意义存在的问题而才渴望“别处意义”,那么他同谢大卫两人则是有着某种契合的:都试图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路径可以绕过文本问题中层生的迷雾和障碍,以通往意义;而且两人都倾向于选择一条“超验”性的道路。

但是,在通往意义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传统文本理论还是大谢大卫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超越语言式”的理论,两者都没有指出一条明晰的道。那个被假设的“上帝之道”,“作者之见”,是意义存在的基础。然而如果人类事先并未完全拥有被假设的意义(而人类理解的局限性注定这个结果是一定的),我们又如何确定我们脚下的路是通往意义而非歧途,是更靠近意义而非远离?但我们又不能否认,这条途径或许的确让我们更接近意义。